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的从政生涯

——由《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中的几张历史照片谈起

○ 金 桥

摘 要: 本文以1912年发生在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的部分历史事件为例,探讨萧友梅生平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段经历,对《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一书中所记述的几处关键图文提出了质疑,并以大量历史档案及一手史料为依据,力图澄清相关照片中的正确人物与事件,还原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决定性”的瞬间,推断萧友梅在“临时政府”中的具体作为,以及他作为“首批稽勋学生”前往德国留学的过程。

关键词: 萧友梅; 临时政府; 魏宸组; 稽勋学生; 《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923 (2022) 01-0115-09

收稿日期: 2021-02-27

DOI: 10.13812/j.cnki.cn11-1379/j.2022.01.015

作者简介: 金 桥 (1966—), 男, 汉族, 博士,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引 言

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生,不但亲历了晚清剧变、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抗日战争等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以自己在音乐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领域的艺术实践,对中国“新音乐”的孕育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被尊称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开拓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然而由于萧友梅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光谱,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长期处于红色主流的对立面,甚至作为“资产阶级学院派”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入冷宫,对于他的深入研究曾长期处于冰封状态。这样的情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改变。萧友梅逝世40周年之际,台湾作曲家、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许常惠撰写《萧友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1980年)一文,对于萧友梅的音乐贡献做出极高评价,并将该文收入他的《中国新音乐家列传》之中,继而诞生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包括张继高所著《萧友梅先生之生平》(1982年,亚洲

作曲家联盟中华民国总会),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所编《萧友梅音乐文集》(1990年),廖辅叔所著《萧友梅传》(1993年),戴鹏海、黄旭东所编《萧友梅纪念文集》(1993年),金桥所著《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2006年),以及近年来所发表的明言《作为新音乐批评家的萧友梅》(2003年)、王勇《萧友梅在莱比锡的留学生涯》(2004年)、孙海《萧友梅留德史料新探》(2007年)、冯长春《金兰之契 志同道合——略论萧友梅与陈洪的新音乐理想》(2017年)等论文。在史料收集方面,则以黄旭东、汪朴所编著《萧友梅编年记事稿》(2007年)为篇幅最大。

以上研究成果,为人们深入了解这位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先行者,提供了较可信的历史资料 and 扎实的研究基础。然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部分著述由于种种原因也将一些有疑问的材料作为史料写进了文稿,由此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状况,为后来者如实认识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人物与历史“设置”了不同程度的障碍。辨别、澄清这些材料的真伪,洞悉这些材料在大历史中的位置,可以帮助我们穿透迷雾,在多年之后力争

还原一个真实的萧友梅。

黄旭东、汪朴所编著的《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以下简称《编年记事稿》),是2007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也是一部按年月记述的萧友梅生平记述。在目前可见的类似文体著述中,《编年记事稿》以其资料之详细、补充之丰富、评说之深入而独树一帜,尤其是书中所编配的450多幅黑白彩色照片、插图,为读者认识编年记事的主人公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立体影像。

《编年记事稿》的两位编著者黄旭东和汪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资深学报编辑和研究员,特别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教育史等领域耕耘颇深、贡献良多。正因为出版社和编著者的“权威性”以及该书资料的“全面性”,《编年记事稿》成为后人研究萧友梅人物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确有不少音乐院校的研究者和学生,在从事相关领域研究时引用了该书的资料。因而当笔者发现《编年记事稿》中存在的一些疑问之处时,感到确有必要对于这些问题加以澄清,以呈现客观真实的音乐人物与历史场景。

在萧友梅先生的生平经历中,影像与文字资料最匮乏的无疑是他的早期生涯。尤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职的那段经历,以往所有的生平、传记类文字中均为一笔带过,清晰的照片影像也是寥寥无几,致使读者对那段经历只能留下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因而当笔者阅读到《编年记事稿》中“民国元年”那一段落时,先是对该书刊印的诸多新见照片喜出望外,继而又对其中几张照片及其说明文字产生了深究的愿望。

历史性的一刻

《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第67页,刊印的一张黑白人物合影,是1912年的第一张历史照片,文字说明为:“1月12日,参加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前排右起第3人为萧友梅。”

如果这张照片被证属实,则至少能说明以

下几点:萧友梅经历并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一刻——“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且作为早期“中国同盟会”的一员,他最迟在那天就已是“临时政府”的一员,终于有机会为共和理想无私奉献的同时,他也应该在“大总统受任典礼”上亲耳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庄严宣读就职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①

然而仔细研判这张照片并细读辛亥革命历史,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之处。在冯天瑜、张笃勤编著的《辛亥革命图志》^②中,明确记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并组织临时政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也清晰记录“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③。实际上在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记录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日期不仅明白无疑,连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有明确的记载,“南海影业”拍摄的纪录片《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中,就任仪式时间地点记载为1912年1月1日晚约11点于南京西花园大堂(原清两江总督署大堂);许师慎在《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中也有详细文字记录,“是日,下午十时举行临时大总统受任礼,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省代表及各军政长官等排立两阶,孙中山入礼堂,众呼万岁!就位后,各部人员向总统行三鞠躬礼。各炮台鸣炮二十一发。大总统就任礼序如下:一、军乐,二、代表报告选举,三、总统誓词,四、代表致欢迎词并致印绶,五、总统盖印宣言,六、海陆军代表致颂词,七、总统答词,八、军乐。”^④

①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壹),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第3;3页。

②冯天瑜、张笃勤编著:《辛亥革命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6页。

④现载于陈宁骏、欣辰编著:《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揭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这样看来,《编年记事稿》第67页上的这幅明媚阳光下的照片,不可能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现场所摄。真实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任仪式,时间在1912年1月1日22:00—23:00之间,地点在南京熙园(又称西花园)大堂。或许由于就任仪式的准备工作仓促,当时的摄影器材与技术(闪光灯)也很有限,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一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任仪式的清晰照片(仅有事后绘制的油画作品多幅)。

有关这张照片的第二个疑问是说明文字中所注明的“前排右起第3人为萧友梅”,由于笔者熟悉萧友梅先生自青少年至成年之后的几乎所有照片,此照中的“萧友梅”与同一时代的萧先生形象比较,无论在发型、五官、身高方面均存在些许差异。经过多方查找,在两个较可靠的来源先后寻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原图。首先在孙中山先生孙女——孙穗芳博士所编的“国父史迹照片”中收藏有此照片,文字说明为:“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图为举行成立大会后合影。”另在《辛亥革命图志》第246页也载有此图,文字说明为:“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合影,前排左二起为蓝天蔚、蔡元培、黄兴、孙中山、赵仕北、魏宸组、胡汉民。”以上二者,对于历史事件以及发生时间的记录完全一致,对于出席主要人员的记录也非常明确,基本可以采信。疑问至此得到初步解答,此照片中的人物都是民国首届“临时参议院”的成员,被《编年纪事稿》编者标注为“萧友梅”的,原来是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清末民初著名民主革命家、外交官魏宸组。

魏宸组(1885—1942)比萧友梅年轻一岁,出生于湖北省江夏县,曾为清朝法政通榜举人的他,却在1903年与志同道合者在武昌秘密组织反清聚会。同年被清政府选派赴比利时留学后,他于1905年在比利时会见孙中山,并组织留学生一同加入了同盟会,为欧洲同盟会核心干部,负

责联络法国、比利时的留学生。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魏宸组就任内阁“外交部次长”,后又在唐绍仪内阁担任“国务院秘书长”。1912年底,他被派任中国驻荷兰公使,1919年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巴黎和会,曾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后又担任中国驻德国、波兰公使,1942年在上海逝世。作为清末民初最活跃的外交人才之一,魏宸组不仅在临时政府和之后的唐绍仪内阁担任要职,并且长期活跃在中外交往的国际舞台,被时人誉为“爱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

需要说明的是,《编年记事稿》中引用的这张照片清晰度不高,并且不是完整原照,而是裁剪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许正是因此而发生了时间、地点、场景、关键人物的误判。综合孙穗芳博士的“国父史迹照片”中收藏照片,和《辛亥革命图志》中的照片与文字说明,判断此照片的正确内容为: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原江苏省咨议局大楼(位于今南京北湖南路)举行成立大会,合影时前排左二起为蓝天蔚、蔡元培、黄兴、孙中山(大总统)、赵仕北(议长)、魏宸组(外交次长)、胡汉民(秘书长)等临时参议院成员。

实际上,1912年1月28日在临时参议院门口的合影不止一张,《辛亥革命图志》第246页的照片,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站立于赵仕北议长右侧的这位男士,很明显在容貌、身高上与萧友梅有较大差异。并且这张合影中的人物除了一些军界人士之外,几乎全都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在这里如果出现“临时政府秘书”并且立于议长与秘书长之间,显然也不符合常情与逻辑。

根据以上同一场景两个不同角度的照片,第一张照片的疑问基本豁然开朗。《编年记事稿》由于引用了不正确、不完整的历史照片,在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内容、关键人物方面做出了错误判断。没有证据证明萧友梅参与

了1912年1月1日晚间的临时总统就任仪式,被注明“右起第3人为萧友梅”的男士,实为“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二人照片对比。(见图1)



图1

萧友梅(摄于1912年初) 魏宸组(摄于1905年)
魏宸组(摄于1912年初) 魏宸组(摄于1912年底)

仔细观察这几张人物的局部容貌照片,魏宸组的发际线较平,发量较多(到了年底则更多),尤其双鬓处头发相当浓密,眉毛较平而浓,脸颊稍圆而略丰满,年轻时甚至有些“婴儿肥”;而萧友梅的发际线呈现左高右低的形态,发量较稀疏(左上额头有脱发先兆),脸颊较为瘦削,下巴相对较尖,眉毛是中间低而两边高,这一特征在他年长后更为明显。平心而论,以上几张照片中的人物外貌确有几分相像,但是对于熟悉其各自外貌特征的研究者来说,不会将他们判断为是同一人。

拜谒还是告别?

《编年记事稿》第68页,刊印了1912年的第二张历史照片,文字说明为:“2月15日,随孙中山拜谒明孝陵,并参加中华民国统一大庆典。孙中山后是萧友梅(第2排左起第3人)。”

很遗憾的是,《编年记事稿》的编者在此引

用的依然是一张不完整的历史照片,并且再次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误判。

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藏室收藏有不少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的珍贵老照片,2016年11月8日至12月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十一展厅,举行了“天下为公大道行——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国家博物馆对这张照片所做的文字说明为:“1912年3月29日,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戍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在南京愚园为孙中山举行饯别会后合影。”另据记载,“1912年3月29日,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戍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在南京愚园(胡家花园)春晖堂为孙中山举行饯别会。最前面一人:王芝祥;第二排左起:黄兴、唐绍仪、孙中山、王宠惠、吕志伊;第三排左1马君武、左2徐绍桢、左4魏宸组、左5黄钟英、左6黄郛、左7朱瑞、左8姚雨平;第四排左2陈懋修、左3柏文蔚、左5居正、左6景耀月、左7蔡元培、左8王鸿猷、左9朱卓文。”^⑤

以上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同样完全一致,后者对于出席人物的记录非常详尽,并且都给出了明确的地理坐标——南京愚园(位于今南京秦淮区龙蟠中路)。这是一座位于南京城西南隅初建于明代的著名园林,曾为中山王徐达后裔徐傅的别业附园。1873年任苏州知府的胡恩燮(字煦斋)购得此处地皮,他于1874年仿照苏州狮子林在此建立了清远堂、春晖堂、水石居等36景,并取名为“愚园”,这座金陵著名私家园林俗称“胡家花园”,最明显的标记是当年愚园春晖堂门柱上的两副楹联:

旧址拓西园,接山城迤邐,水木清华,湛露昔承恩,胜国雄藩休沐地;

新图规北苑,经杨柳池台,蘼芜门径,飞英重作会,嘉宾贤主艳阳天。

^⑤图片及文字说明见国家博物馆:“天下为公大道行——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珍贵留影”部分展品。

烟霞供养斯得上寿，诗酒酣嬉能娱古欢。

从上述的完整版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的正是这两副文辞古朴的楹联。

由此地标并结合国家博物馆馆藏说明可以判断，此照的拍摄地点可以确定位于南京愚园春晖堂而非明孝陵；历史事件为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戍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为孙中山举行饯别会，而非拜祭明孝陵与参加统一大庆典；时间为1912年3月29日，而非2月15日；关键人物中站立于孙中山身后的是魏宸组而非萧友梅，经过仔细辨别，萧友梅的身影并未出现在这次“饯别会”的合影中。《编年记事稿》在此页再次对时间、地点、事件、关键人物做出误判。

临时政府的解散与接收

《编年记事稿》第70页，刊登的是一张曝光率较高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萧友梅自编影集》编号1，可见影集编者对其的重视程度。《编年记事稿》对于此照片的文字说明是：“3月11日，唐绍仪来南京与临时政府商谈南北议和，孙中山介绍他与临时政府官员见面并合影留念。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前摄影：第一排：1.萧友梅、2.唐绍仪、3.孙中山、4.胡汉民、5.冯自由……”

这张照片中的关键人物毋庸置疑，坐在第一排最左侧的萧友梅神色庄重、表情严肃，坐在同一排萧右侧的，是清末民国叱咤风云的三位广东同乡，内阁国务总理唐绍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最右侧是萧的同事——临时政府机要秘书冯自由^⑥。然而除了人物之外，该照片的其他内容仍有待商榷。

首先，辛亥革命期间的“南北议和”，指的是武昌起义之后的1911年12月9日，北洋军首领袁世凯经过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密商，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南下汉口，后又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与南方起义军议和代表伍廷芳进行谈判，至18日，南北代表基本达成了以“拥袁共和”

为核心的协议。这个协议避免了南北双方继续鏖战导致的生灵涂炭，也在和平的前提下确保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以上史实，即为辛亥革命期间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南北议和”。很显然，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的1912年3月，宣统皇帝已经宣布“逊位”，南北双方早已休战，共和制度业已确定，因此并不存在“南北议和”这样的议程。

其次，唐绍仪在3月间的确南下南京，只不过具体时间和目的都另有说法。孙中山虽在南方革命党人的众望所归下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他深知当时革命党的实力尚无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相抗衡。在南京临时政府1月11日、17日、19日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答复的情况下，他更加清楚西方列强所信任支持的总统人选是谁^⑦，为避免内战，也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共和成果，孙中山以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遵守约法为前提，同意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当宣统皇帝2月12日在袁的胁迫下宣告“逊位”后，袁世凯于次日通电赞成共和（13日），孙中山遵守诺言随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4日），并表示：“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之后参议院在2月15日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者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族第一次基本和平地完成了全国性的政权交替。

孙中山在随后的通告中称，“今国务总理唐

⑥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历史学家。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机要秘书，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经孙中山、黄兴推荐5月7日被任命为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汇集革命史料，在稽勋局局长任内，冯自由经手保送了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谭熙鸿、李骏、李四光、刘鞠可、赵昱、吴玉章、李晓生、吴昆吾、马素、萧友梅、黄芸苏、刘貽燕、张竞生、冯伟（冯自由胞弟）等50余人出国留学。

⑦据孙中山事后所述：“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3页。

君(绍仪)南来,国务员已各任定,于4月1日在南京交代。本总统于是日解职……本处各办事人员仍照旧供职,以待新国务员接理。”

这张照片的关键人物唐绍仪(1862—1938),本与孙中山和萧友梅都是同乡,作为清廷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他于1874年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归国后成为晚清朝廷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深受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信任与赏识,并在武昌起义后南北对峙时被任命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由于他在谈判中所采取的开放态度与灵活策略,双方的谈判奇迹般地取得了共识,为政权的和平过渡与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3月13日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内阁国务总理后,唐绍仪于3月下旬抵达南京,在3月30日的欢迎宴会上,蔡元培向唐致辞并邀请其加入“同盟会”,在黄兴等人的共同劝说下,唐绍仪决定加入同盟会。

事实至此已很清楚,民国元年(1912年)3月13日,唐绍仪在北京出任内阁国务总理,他于当月下旬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商议南北政府的交接工作,南京临时政府3月24日“陈其美为告知唐绍仪准午十二时专车来南京事至总统府各部万火急电”^⑧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唐绍仪前往南京的目的和具体时间;《蔡元培年谱长编(上)》1912年也明确记录,3月25日,“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到南京,组织内阁,坚请蔡先生仍任教育总长……”^⑨另在孙穗芳博士所编的“国父史迹照片”中,也收藏了这张照片并且明确记录为:

“1912年3月25日,国父介绍临时政府官员于唐绍仪后合影。前排右起为冯自由、胡汉民、孙中山、唐绍仪(萧友梅未标出)……”由此看来,目前可辨认的萧友梅第一张摄于临时总统府的照片(《萧友梅自选影集》编号1),可以确定拍摄时间是在3月25日,而非在3月11日(其时唐绍仪尚未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唐绍仪南下目的并非“议和”而是为了商讨南京、北京临时政府之间“国务员名单”等人员交接。

另外可以补充的是,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人物,除了来访的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已宣布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之外,黄兴、王宠惠、伍廷芳、蔡元培、魏宸组、于右任等重要内阁成员均不在场,反倒是秘书处的诸位秘书大都在列,其中包括萧友梅的好友兼歌曲创作搭档,广东鹤山著名词人——易韦斋(立于萧友梅与唐绍仪之间)。

卅载蹉跎误 天涯惜此时

《编年记事稿》第71页,此页刊登的照片是“萧友梅在南京总统府花园与胡汉民等合影”(《萧友梅自编影集》编号4)。

这张照片的时间、地点与内容,与历史记载完全符合。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于两日后乘车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全体工作人员各奔前程之前,孙中山嘱托蔡元培对于旧部的前途做出安排,由于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愿为出国留学,蔡元培于是对“总统府秘书及革命有功之青年60余人”^⑩,做出了在财政部筹备款项之后,由新政府教育部派送各国留学的妥善安排。而鲜少有人知晓的是,之后接手操办此事的,正是原南京临时政府的机要秘书——冯自由(详见后述)。

分手之前,萧友梅与各位前同事与老朋友依依话别,除了留下总统府假山前的合影外,胡汉民、廖仲恺还给萧友梅留下了题诗^⑪。

曾与他在日本期间即有革命同志之谊的廖仲恺题诗为:

卅载蹉跎误,天涯惜此时。气寒冰上鬓,腊冬鼓催诗。历历过来事,悠悠乡国思。穷边春不到,慢

^⑧现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伍),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第1631页。

^{⑨⑩}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9、493页。

^⑪廖仲恺、胡汉民的临别题词,见丁善德主编:《上海音乐学院简史(1927—1987)》。

说物华移。兀生了无趣，万斋守岁阑。枕孤鸳梦冷，云远雁行平。松柏励初志，风霜改素颜。遥知南岭表，先知早春还。录吉林岁暮杂感旧作呈

友梅兄鉴 廖仲恺

21岁即中“举人”，同为“同盟会”元老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题诗为：

不到短长亭，未是愁时候，天遣流莺，抵死催归，思浓如酒。友梅我兄正之！

汉民

萧友梅同为总统府秘书的任鸿隽曾有以下回忆：“大约在3月28、29日，唐绍仪总理带了俞人凤、顾维钧等，来临时总统府接受秘书处。我们原在秘书处任职的人要做官的，自然可以随着唐总理北上混个一官半职，但有一部分人则提出宁愿再到外国去学一点有用的东西，为将来建设祖国服务，这个当时得到了孙总统的批准，后来交稽勋局办理。这便是我们这批稽勋学生的由来，其中包括吴玉章、萧友梅、谭熙鸿、李骏、刘鞠可、吴芸芬、杨铨及我等，但也包括了许多既不在秘书处又与革命事业无关的人，是当时建议的人所不曾料到的。”^⑫在这段文字中，任鸿隽有关日期的回忆产生了细微偏差（本人也说是“大约”），但他对唐绍仪总理来南京的目的叙述得非常具体，对有志于继续学习的年轻秘书们的去向——“稽勋学生”的由来和人员组成做出了准确的描述，其中就包括了任的秘书处同事——萧友梅。

《编年记事稿》第72页，刊登了1912年历史照片中的第5张，文字说明为：“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职前与总统府同人合影，前排右起第2人是萧友梅。”这里只有时间是正确的，但照片的内容并不是与总统府同人合影，而是孙中山当日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后的合影，照片中站在第一排蔡元培右侧的，可以确定不是萧友梅。由于《编年记事稿》所用裁剪照片既不完整也较模糊（原照白色方框中的部分），因此对照片内容和人物做出了误判。实际上，原照上面印出的文字即清楚表明，该照片为“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

议院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的纪念留影。《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壹）中也收藏了该照片，文字说明为：“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前往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除大总统职务。这是孙中山先生解职后与参议员们合影，前左五为孙中山，前左三为黄兴。”

显而易见，这张照片中的“参议员”中并不包括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的编者，将“总统府”工作人员与“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们混为一谈了。

“稽勋学生”的来历与派出

《编年记事稿》第74页，刊登了1912年最后一张历史照片。文字解释为：“10月17日，留学同行者出发前在上海合影，前排2谭熙鸿、5刘鞠可、7张竞生、后排1杨铨、4任鸿隽、6萧友梅、7宋子文。”（《萧友梅自编影集》编号3）

这里的照片与文字均与史实相符。这批“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派出的一批留学生，他们也被称为“首批稽勋学生”。所谓的“稽勋”，是孙中山于1912年2月19日急咨临时参议院，并请该院速行建议在临时政府时代开设的稽勋局，其目的在于负责抚恤、褒奖革命有功人员，推动革命善后事宜的完成，由该局派出的这批公费留学生，即被称为“稽勋学生”。当冯自由1912年5月被任命为该局局长后，原本主张公派留洋学生由教育部查核办理，但由于教育部“经费困难”，最后此事仍归稽勋局负责办理，最后是由国务总理唐绍仪借得比利时之款项^⑬，经由财政部拨付22 000余元作为行资及治装费，再经教育总长致电通知萧友梅等人“已筹得款项，即可放洋”的好消息，此时是1912年的10月上旬，萧友梅已在广东任教育司学校科科长几个月了。

冯自由本人也曾回忆并记录“首批稽勋学

^⑫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载《辛亥革命回忆录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

^⑬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载上海《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1937年4月10日）。

生”,“于民元秋间出洋,即任鸿隽、杨铨、卢维溥、萧幼梅、刘鞠可、黄芸苏、谭熙鸿、刘貽燕、吴永珊、马素、李骏、邵逸周、李晓生、居励今、宋子文、张承樵、冯伟、余森、王夏、吴昆吾、周仲良等是也……”^⑭。在这里,冯局长的记忆发生了一点误差,将不久前还是同事的萧友梅名字被误记为“萧幼梅”。1912年10月17日,“首批稽勋学生”在上海集结准备出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回国成为各自领域的出色人才,任鸿隽成为著名科学家,谭熙鸿在北大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系,王世杰在教育、外交方面成就颇丰,李四光对中国地质学研究卓有贡献,萧友梅则成为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这些不远万里前往欧美的“稽勋学生”,与其说是为了个人荣华博取功名,毋宁说是为了建设国家社会而尽一己之力。

自1909年至1912年,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萧友梅的仕途经历了由“文科举人”到“总统秘书”的戏剧性转折。如果说此前任清廷“七品小京官”纯属是掩护革命身份的曲线救国之举,之后在“临时总统府”任中山先生秘书,则是他为一生所追求的共和理想无悔奉献的荣光。从他日后的言行来看,民国初年的这段从政经历,不仅了却了他追随“总理”践行理想的夙愿,也是他真正职业生涯中一个光辉的起点。

至于萧友梅究竟何时来到“临时政府”担任“总统秘书”,以往的大部分纪实文字皆无记录,基本上对这段历史一笔带过。由于辛亥革命与临时政府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时期,完备的资料记录与存档工作一时难以进行,史料的匮乏与凌乱也可理解。在《萧友梅编年记事稿》1912年所用的6张历史照片(不包括文书扫描)中,有3张其中所指之人并非萧友梅而是另有其人,4张的时间、地点、事件与史实不符,也给这一判断增加了难度……目前掌握可用来证明萧友梅抵达时间以及在总统府服务经历的,只有以下几件材料。在《上海音乐学院简史(1927—

1987)》上所刊出的萧友梅“秘书员委任状”(见图2),上面留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的签名,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的清晰日期,当为可信之物;胡健国主编《萧友梅先生年表》中则记载,“1912年,二十九岁,3月,任孙中山先生临时总统府秘书。5月,任广东教育司教育科科长。10月,经北京教育部选派赴德国留学……”^⑮还有就是在萧友梅逝世后不久国立音专所刊印的《萧友梅先生传略》(见图3)单页,其中有关1912年这段是这样记载的:“中华民国成立任总统府秘书(民国元年三月)。同年五月,任广东教育司科长。十一月由北京教育部派往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科专攻音乐理论,并在同地国立大学^⑯哲学科研究教育。”另外,《萧友梅音乐文集》中“萧友梅生平年表”的记载为,“1912年,民国成立,3月,由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秘书……”^⑰显而易见,以上材料将萧友梅任职临时政府秘书的时间,都指向了1912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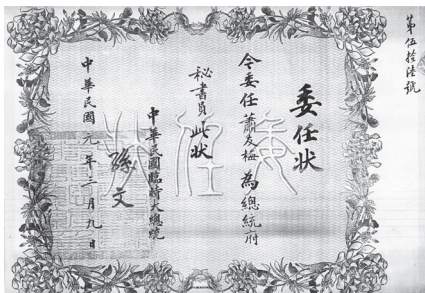


图2 萧友梅总统府秘书员委任状

结 论

以上文字,仅是对《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中1912年的几张老照片及其文字说明所做的简略

^⑭冯自由:《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载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24页。

^⑮《萧友梅先生年表》,载胡健国主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25辑,台北:国史馆2001年印行,第446页。

^⑯今译“莱比锡大学”。

^⑰陈聆群等人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5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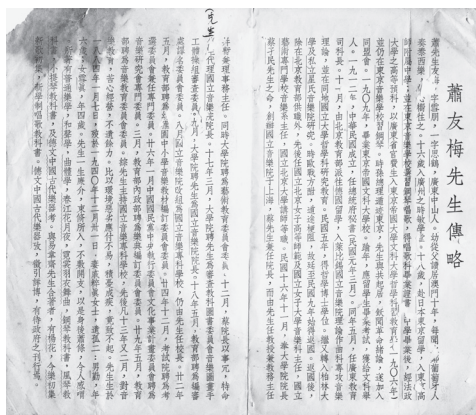


图3 《萧友梅先生传略》

考证。令人略感有些意外和遗憾的是，在这一年度的“记事”中所选用的6张历史老照片，有4张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错误，其中有3张在时间、地点、历史事件、关键人物等方面做出了“张冠李戴”式的全面误判，甚至将中国近代其他历史人物的影像，多次作为萧友梅在临时政府中的经历而加以记述，从而对记事对象的行为产生了错误描写。鉴于《编年记事稿》在萧友梅研究中所具备的重要参考作用，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方面的重要性，更是为了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决定性”时刻，以及萧友梅本人职业生涯的真实性负责，笔者对本年度的历史照片及其说明文字进行了基于“影像学”与近代历史相结合的探究，力

图还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相。

关于萧友梅先生何时成为“临时政府”一员的问题，在有更加确凿有力的史料被发现之前，目前可见的四份材料都将时间指向了3月，也就是“临时政府”存在的最后一个月。正如居其宏先生在《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写在〈萧友梅编年记事稿〉出版之际》中所言：“无论人们持有何种历史观，都必须要把‘史实第一性’置于学术研究的首位。”考证的结果也再次提醒我们，历史影像的搜寻与研判在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扮演着多么关键的角色，如果引用质量不佳、内容不全的影像，很可能出现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与此同时，原始资料、完整影像、多方来源与权威媒介的佐证，也是学者做出重要判断时必不可少的依据。

《萧友梅编年记事稿》毫无疑问仍是目前研究萧友梅生平时不可或缺的史料集成，出版以来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好评。正因如此，如对其中的疑问与错失视而不见，不仅会对未来的研究者产生长久的误导，也是对历史和学术研究本身的不负责任。有鉴于此，谨以此短文求教于熟悉辛亥革命历史和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专家学者，也期待有更多可靠材料，来描绘萧友梅在其光辉生涯中的每个真实瞬间。

责任编辑：姚 岚